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
2003年12月，頁269~297

BIBLID1012-8514(2003)32p.269-297
2003.10.6收稿，2003.11.6通過刊登

§研究討論§

# 科舉文獻與「科舉學」

劉　海　峰*

## 提　要

「科舉學」是科舉時代的固有辭彙，古代「科舉學」即「科舉之學」，一般是指備考科舉的學問，曾包含「文選學」、「策學」等專學。現代「科舉學」則是指研究科舉的專學，是以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歷史上存在的科舉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專學，已逐漸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科舉學」不是關於一時一地或一人一書的學問，而是與一千三百年間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書籍和幾乎所有地區有關的一門學問；不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局部，而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整體的一門專學，又是至今還有相當現實意義並和東亞及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有關的一門專學。從科舉文獻的角度，可以明顯地看出「科舉學」的廣博性。

狹義的科舉文獻主要包括登科錄、題名錄、鄉試錄、會試錄、同年錄、科齒錄、硃卷、闈墨等以及八股文、試帖詩選本和現存各類科舉試卷、備考科舉的專門書籍，其數量巨大，是中國歷史文獻中一個專門獨立的大類，具有很高的歷史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和人文地理學研究價值。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很少有像科舉文獻這樣數量眾多、價值甚高卻尚未被充分利用的一類。自成體系、內容豐富的科舉文獻充分地體現出「科舉學」的廣博性，從一個方面有力地支撐著「科舉學」的學科構架，使「科舉學」這一具有遠大發展前景的專學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

關鍵詞：科舉學　科舉文獻　考試　硃卷　八股文

*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一、引言
二、古今「科舉學」內涵的演變
三、科舉文獻的定義、種類與數量
四、科舉文獻與「科舉學」
五、結語

# 一、引言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考試制度，對古代中國政治、教育、文學、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至於民國以來許多學者，都將隋唐至清末科舉制廢止之前的長時期稱之為「科舉時代」。科舉在當時社會上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被視為中國「政治體系和社會體系的核心」[1]或「在中國政治理論和社會實際結構中居於中心的地位」。[2]對這麼一項關乎世道、人心和風俗的重要制度，自然會引起古今學者的關注。古代學者重視「科舉學」，不僅是因為其影響無所不在，而且與自己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現代學者關注「科舉學」，則是因為科舉研究蔚為風氣，且具有明顯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當代「科舉學」是以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歷史上存在的科舉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專學。一門傳統學術領域中的專學必須要有特定的豐富的文獻支撐。本文將在闡述古今「科舉學」內涵演變發展的基礎上，探討科舉文獻的定義、種類和數量，並分析科舉文獻的價值以及「科舉學」成為一門專學的緣由。

---

1 《倫敦日報》北京通訊員一八七五年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令人恐怖的考試制度〉，見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北京：三聯書店，2001），90。

2 E. A. Kracke, “Relig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in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252-268.

# 二、古今「科舉學」內涵的演變

「古老的過去, 短暫的歷史」常被用作描述新事物、新學科的套語。用這句話來描述「科舉學」，可以這麼說：「科舉學」有非常古老的過去，但現代「科舉學」的歷史卻相當短暫。「科舉學」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問。說其古老，是因為「科舉學」或「科舉之學」的用法出現很早，科舉時代有千百萬讀書人曾熱中備考科舉的學問，且自從科舉制產生一段時間以後便有人開始進行科舉制度及科舉史研究，其研究歷史長達千餘年；說其年輕，是指以往並未有意識地將科舉作為一個專門領域來研究，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提出將「科舉學」作為一門專學，或者說作為一個專門領域來研究之後，才更注意以整體的觀點，以新的理論、新的方法、新的視角、新的高度對科舉進行科學的研究，賦予了「科舉學」一詞以新的內涵和新的意義。

與「文選學」、「紅學」、「徽學」等詞語類似，「科舉學」一詞並非現代人的生造，而是古已有之。自從宋代「科舉」逐漸取代「貢舉」的概念之後，有不少人使用「科舉學」或「科舉之學」的稱法，[3]以下略舉數例。

宋代黃震《黃氏日抄》卷九七〈廣德縣尉趙君墓碣〉載：

> （景定四年）既葬碣墓，千里請銘於某曰：吾父幼嘗刲股活其母，長魁國子監，以雜犯黜，遂棄科舉學。[4]

章如愚《山堂考索》後集卷二七〈士門．學制類〉載：

> 崇甯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甲戌，議建外學。十月十七日戊辰，初建辟雍，御制〈辟雍記〉，鄉舉里選之法掃蕩，而士累於科舉，學不為己，捨本趨末，道聽塗說，以應有司之求，僥倖一日，行不考素，賢愚雜揉。[5]

---

3 自隋唐至北宋，科舉之官方正式名稱一般為「貢舉」，但似乎未見「貢舉學」或「貢舉之學」的用法，不過當時「策學」和「文選學」實際上可以算作「貢舉學」的內容。

4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708 冊，頁 1044。

5 章如愚，《山堂考索．士門．學制類》（北京：中華書局，1992），後集卷 27，619。

葉適《水心集》卷一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 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二公不為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著金石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6]

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五〇〈題韞上人疊秀軒賦後〉云：

> 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致為誇，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弊幾二百年。[7]

明代永樂七年，晏璧為陳謨《海桑集》所作序文說：

> 先生生元大德乙巳間，敏而力學，猶及登宋元遺老巨公之門，務躬行踐履，嘗與計偕，試於有司不偶，即棄去，肆力古文辭。元運既遷，科舉學廢，鄉人士子從先生講道德性命之懿，接踵於戶。[8]

張嶽《小山類稿》卷一六〈荒山朱先生墓誌銘〉載：

> 先生諱軫……以成化甲午七月十四日生……尤留心世務，嘗采擇當今可行者，聚以成帙，通達詳練；見之者知其有治事之才，非止於經學專門者也。自科舉學興，國論不下采於鄉。[9]

清代汪琬《堯峰文鈔》卷二〇〈陳處士墓表〉：

> 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則當鍵戶濡首，習為科舉學耳。[10]

自宋代到清代不斷有人使用「科舉學」一詞，當時的「科舉學」意指應舉的學問或備考科舉的學問，也就是一些應試的文體作法或學問。這一用法一直沿用至清末，如清末文學家沈曾植《海日樓詩集》卷一〈古詩〉開首便有「少為科舉學，壯涉百家流」之句。[11]

---

6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1164 冊，頁 310。

7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203 冊，頁 666。此處的「蘇學」，也是類似於「文選學」、「徽學」的用法。

8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232 冊，頁 526。

9 張嶽，《小山類稿．荒山朱先生墓誌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卷 16，299~300。

10 《文淵閣四庫全書》，1315冊，頁407。

11 沈曾植、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92。

從唐代至清末，參加科舉是大多數知識分子實現人生抱負的必經階段，備考科舉而付出的努力大到足以使這一類備考成為一種特別而專門的學問，因此才被稱之為「學」。使用「科舉學」一詞的中國古代文獻還有許多，以上只是略舉數例，但已足以說明「科舉學」一詞乃古已有之。

「科舉學」實即「科舉之學」的簡稱。在科舉時代，除直接使用「科舉學」一詞之外，更多的人是使用「科舉之學」的提法。如《程子語錄》載程頤的觀點說：「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耳。」孫鼎臣在〈治論〉中說：「天下之習，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為科舉之文歟，則其學為科舉之學。」[1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六在談到元代袁俊翁《四書疑節》時，認為該書「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在清嘉靖八年（1803）貯書樓刊刻的《眉園日課》中，錄有眉園家塾的〈學規八條〉，在「身心之學」、「政治之學」、「經籍之學」、「史漢之學」、「文選之學」、「說文之學」、「館閣之學」之後，第八條是「科舉之學」。[13]從「科舉之學」與「政治之學」、「文選之學」等並列的情況來看，這裏的「科舉之學」已有專門之學的含義。有關「科舉之學」的提法實在太多，本文沒有必要詳細列舉。總之，「科舉之學」是當時人的慣用法，而「科舉學」實即「科舉之學」的簡稱，通常帶有一定的貶義。

近似於「科舉學」的含義而且更為常見的詞語是「舉業」或「舉子業」，此種用法在古代文獻中不勝枚舉。同時也可見到介於「科舉學」和「舉子業」之間的「舉子學」或「科舉之業」、「科舉業」等詞語，如《東萊別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載朱熹問呂祖謙說：「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朱子大全》卷七八〈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則有「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的說法。《堯峰文鈔》卷二〇〈敕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藺公墓表〉云：「公諱獻征，字某，少治科舉業甚工。」

12 盛康，《皇朝經世文編續編．禮政．貢舉》（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卷66。

13 參閱鄧雲鄉，〈《眉園日課》書後〉，《中國文化》第13期（1996，北京），160~171。

另外，還有「三場之學」、[14]「進士之學」[15]等類似的提法。上述「舉子學」、「科舉之業」、「科舉業」或「三場之學」、「進士之學」的含義與「科舉學」或「科舉之學」基本相同，都是指備考科舉的學問，或有關科舉的學問的意思。

而且，外國學者中也有使用「科舉學」一詞的。韓國（朝鮮）歷史上曾長期實行科舉制，也曾出現與中國科舉類似的問題。朝鮮李朝後期，集儒學實學派大成的丁若鏞（丁茶山，1762~1836）曾批判當時儒學界的諸多傾向，在〈五學論〉一文中，他對性理學、訓詁學、文章學、科舉學、術數學等五學加以批判。[16]這裏所謂的「科舉學」也是指應考科舉之學，但與訓詁學、文章學等並列，也已含有一定的專門學問的意味。

當然，總體而言，古代或科舉時代的「科舉學」與我們今天所說的「科舉學」含義是有所不同的，古代的「科舉學」或「科舉之學」通常指的是如何考中的學業或學問，即應舉之學或應試之學；當代的「科舉學」指的是研究中國及東亞國家歷史上的科舉考試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的學科或學問。簡言之，古代「科舉學」是指備考科舉之學，現代「科舉學」是指研究科舉之學。但古代廣大讀書人熱中於「科舉之學」留下了大量的資料，為今天研究「科舉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17]「科舉學」是中國歷史上的固有名詞，只是現今的「科舉學」被當代人賦予了新的更為豐富的學術性含義，可以說是古語今用或古為今用。

為了明瞭「科舉學」內涵的演變，我們可將其與當今學術界公認的一些專學進行比較。「科舉學」內涵的演變發展類似於「紅學」、「徽

14 明．曹安，《讜言長語》（二）（北京：北京圖書館，1988），卷上說：「三場之學，在今時為出身之階梯也。」見蔡春等，《歷代教育筆記資料》（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0~）第3冊明代部分。

15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上疏指出：「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53，1168。

16 丁若鏞，《茶山全書．五學論》1集，卷11。參閱韓國高麗大學教授尹絲淳，〈實學意蘊及其嬗變〉一文，載《當代韓國》1997年第1期（北京），10~18。

17 劉海峰，〈「科舉學」：一門古老而全新的學問〉，《高教自學考試》1998年第2期（濟南），10~12。

學」與「文選學」等概念古今含義的變遷。[18]「紅學」一詞最初在清代帶有一定的玩笑性質，是指談論或閱讀《紅樓夢》的意思。李放在《八旗畫錄》中說：「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云。」徐兆瑋〈遊戲報館雜詠〉詩注云：「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後來，隨著《紅樓夢》研究的日益發展，紅學才獲得了一門專學的真實內容。[19]古代的「徽學」是指以朱熹為開山祖的新安理學，和今天所稱「徽學」的概念及涵蓋的內容不一樣。有的學者認為前一「徽學」是單一學科，屬於學術史；後一「徽學」包含了多種學科，屬於地域文化。[20]

「文選學」在科舉時代基本上從屬於「科舉學」。古代「科舉學」曾涵蓋好幾門專學。唐代的「策學」和「文選學」可以說是當時「科舉學」的產物。策學出現得很早，《舊唐書》卷一〇一〈薛登傳〉載，武則天時左補闕薛登上疏論選舉之弊曰：

> 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輯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21]

《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制科舉〉所載略同，惟「放效」作「仿效」，「浮虛」作「虛浮」，並繫年於天授三年（692）。所謂「策學」，就是準備科舉考試中寫對策的學問。白居易為應考進士科曾作了大量的模擬策問，以至於有《白氏策林》流傳下來。從宋代以後，「策括」之類的書籍盛行，到清代便有《策學備纂》、《策學備纂續集》、《策學例言》、《策學淵萃》、《策學百萬卷統編》等策學著作。策學完全是應試技巧之學，當科舉制不復存在之後，策學也就徹底消失。

---

18 劉海峰，〈科舉教育與「科舉學」〉，《中國書院》第5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61~180。

19 參閱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1~22。

20 張海鵬，〈徽學漫議〉，《光明日報》2000年3月24日第3版。

21 《舊唐書．薛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3138。

唐代「文選學」也是受進士科以文取士的推動而出現的。史載曹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22]《新唐書》卷二〇二〈李邕傳〉云：李邕父李善為《文選注》，「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宋代「文選學」仍很發達，而唐宋時期之所以會有人「以講《文選》為業」，[23]主要是由於當時有「文選爛，秀才半」的社會背景。[24]

如果說「紅學」、「徽學」與「科舉學」詞義的演變有相似之處的話，那麼古今「科舉學」的關係與古今「文選學」的關係則是幾近相同了。古代或者說科舉時代的「文選學」雖也有學術目的，但主要是為應舉考生服務，重點在於學習應用《文選》的章法技巧；現代「文選學」已不再有功利的目的，不是作為「新科利器」而是作為重要的學術研究對象而存在和發展的。「文選學」是學術界公認的一門專學，古今「科舉學」的聯繫與區別和「文選學」如此相似，「科舉學」成為一門專學也就理所當然了。

因為中國語言文字的習慣，中國人向來有稱「學」的傳統，往往將較重要的、研究得較多的對象稱之為「學」，如策學、紅學、漢學、宋學、閩學、關學、文選學之類。但「學」字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亂用的標籤。任何一門專學，都應是義立而後名至。如果某一研究對象內涵不夠豐富，並不具備成「學」的條件，而研究者卻硬是將其加上「學」字，那麼這種「學」也是不成體系且難以為繼的。然而，「科舉學」的內涵和意蘊是如此之豐富，其範圍是如此之廣泛，其成果是如此之豐碩，以至於可以說科舉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25]現代「科舉學」是實至而名歸，它的出現並非任意的生造，而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

22 《舊唐書．曹憲傳》，卷189上，4946。

23 《舊唐書．李邕傳》，卷190中，5039。

24 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8，100。

25 劉海峰，〈「科舉學」：求解科舉研究的最大值〉，《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2年第3期，5~10。

也是勢在必行的。

大凡成「學」者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或特定的文獻，「科舉學」的研究對象便十分專門獨特，而且具有特定的專有文獻。以往人們從「科舉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廣博性、重要性和現實性，以及科舉術語和「科舉學」的概念體系等多方面探討了「科舉學」得以成立的緣由。[26]這裏，我們再專門從科舉文獻的角度探討「科舉學」何以會成為一門專學。

## 三、科舉文獻的定義、種類與數量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在近世以前，用中文記載的文獻數量比任何別的文字的文獻都要多。一八五五年前後，有位西方學者就曾指出：「中國現存的各種著作很可能比歐洲的著作多得多。」[27]一九四八年二月，英國漢學家德和美在擔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的就職演說〈中國——人文學術之邦〉中也談到：「至少到一七五〇年為止，中國的書籍的數量超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28]而中國書籍的增加和印刷術

26 劉海峰，〈「科舉學」芻議〉，《廈門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89~95；楊學為，〈中國需要「科舉學」〉，《廈門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17~19；田建榮，〈科舉學：理論、體系與方法〉，《廣西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70~74；廖平勝，〈「科舉學」研究與教育價值取向的制導〉，《廈門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19~21；鄭若玲，〈科舉學：考試歷史的現實觀照〉，《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90~95；劉海峰，〈科舉術語與「科舉學」的概念體系〉，《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84~89。王嵐，〈科舉學的教育研究價值〉，《教育世界》2001年第1期，138~140；楊李娜，〈科舉學：一門探討考試發展規律的專學〉，《現代大學教育》2002年第3期，59~62；張亞群，〈科舉學的文化視角〉，《廈門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27~33；李均，〈從專學到學科：「科舉學」的應然求索〉，《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47~50。

27 “China: its Earl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Mistransl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s; Causes of the Present War”. *Westminster Review,* Vol. XXXIV, No. II, 1840, 280.

28 劉永主編，《牛津人的輝煌》（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1），453。費正清也持此觀點，見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42。

的普及，與科舉制的推動是密切相關的。宋人岳珂曾說：「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為先，故凡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汗牛充棟矣。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29]從宋代直至清末廢科舉前，中國書籍印刷量最大的還是有關科舉考試的教材（如《四書》、《五經》等）、範文、闈墨、硃卷等各類備考資料和相關文獻，也就是科舉文獻。以下我們具體分析科舉文獻的定義、種類與數量。

關於「科舉文獻」的定義，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較寬泛的定義認為科舉文獻是指與科舉有關的文獻，包括科舉的制度，科試的各項法令規定，考試的內容及文體形式，登科的人物，科場事項以及為指導應付考試的有關程文、墨卷、擬題、選本、房稿、時文、類書等，實際上包含的範圍非常廣泛，加上各時代又有各時代的文獻特點，內容也很複雜，因此比較難以分類。[30]另一種觀點認為科舉文獻是指科舉制度及其相關內容的文字記錄，它的外延非常大，包括考試教材、科目、試卷內容、格式、閱卷方法、規程、朝廷貢舉律令、詔書、科舉題名錄、各地方誌中的選舉志等。[31]還有一種更窄的定義認為科舉文獻是特指科舉題名錄或「科舉錄」，即進士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等。[32]韓國史學研究會理事長李成茂認為科舉文獻（「科舉古文書」）包括試紙、試卷、

29 岳珂，《愧郯錄．場屋編類之書》，卷9，見《筆記小說大觀》第4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378。岳珂所說的「決科之學」即「科舉之學」的另一種表述。關於科舉取士與印刷術的互動關係，可參閱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2000.5，臺北），57~90。

30 張祝平，〈《四庫全書》與科舉文獻〉，《貴州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106~110。

31 沈登苗，〈也談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浙江學刊》，1998年第2期，108~111。

32 駱兆平，〈談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文獻》1984年第20輯，100~126；李大東，〈明代進士題名校勘記〉，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論叢》（寧波：寧波出版社，1996），187。將科舉文獻等同於「科舉錄」的定義偏窄。還有一種含義最窄的說法，是將科舉文獻等同於硃卷，見董蓮枝，〈《清代硃卷集成》的文獻價值〉，《遼寧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瀋陽），56~57，明顯不當。另黃仁生，〈元代科舉文獻三種發覆〉，《文獻》2003年1期，95~105、177，雖未對「科舉文獻」作界定，但從該文內容看來意指科舉試文。

紅牌與白牌（及第出身文告）、榜目等。[33]此外，也有學者用「科舉文獻」來指稱與科舉有關的現代學術論著和古代史料。[34]

筆者認為，科舉文獻是指直接記載科舉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的文獻，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或嚴格意義的科舉文獻是指登科記、題名錄、登科錄、同年齒錄、同年小錄、科第錄、科齒錄、科名錄、題名碑錄、闈墨、硃卷、科舉試卷等科舉文獻，也可稱之為核心科舉文獻，此外還包括專門的八股文、試帖詩選本和專門記載或研究科舉的著作，如《唐摭言》、《制義叢話》、《淡墨錄》等等，[35]以及備考科舉的書籍，如《科名金針》、《登瀛寶筏》、《登科指南》、《舉業卮言》等等。清代學者錢大昕所修《元史藝文志》，按經、史、子、集分類，在「集類」中，專立「科舉類」，所收《易義擬題》、《書義斷法》、《春秋合題著說》、《策學歸宗》、《科舉天階》等書二十一種，[36]便多數是屬於備考科舉的書籍。

廣義的科舉文獻，在上述狹義科舉文獻之外，還包括專門記載科舉的歷史檔案，散見於各種書籍中的科舉試題和試卷，各種文集、地方志、類書中專門記載科舉的部分，以及筆記、小說、戲曲等所有各類文獻中關於科舉的直接記載。或可稱之為「科舉資料」、[37]「科舉史料」。[38]鄧嗣禹在研究科舉制多年之後，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中國考試制度史》一書所列參考書目之後指出：「中國載籍言及考試者，幾乎無書無之。」

33 李成茂，《韓國科舉制度史》（漢城：民音社，1997）（韓文），120~153。

34 賈志揚（John W. Chaffee），《宋代科舉》（中譯本，原名：*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12~21。

35 像陳彭年，《貢舉敘略》、俞憲，《皇明進士登科考》、顧鼎臣，《明狀元圖考》、毛奇齡，《制科雜錄》、陳國霖等，《國朝貢舉年表》、徐松，《登科記考》一類的古籍，既是古代的科舉研究性著作，對現代「科舉學」而言，也是具有科舉文獻的意義。對此類著作，筆者擬另文考述，本文不再詳論。

36 《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5冊，81~82。

37 森田憲司，〈元代の科舉資料〉一文，收入《東方學報》京都第37冊（2001），其「科舉資料」一詞基本上等同於「科舉文獻」一詞。

38 宮雲維，〈試論宋人筆記中科舉史料的特點〉，《浙江學刊》2002年第5期，185~189。

科舉考試在社會上的影響無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國居住過二十二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1585~1658）所說的：「這些科舉考試構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事務，因為它事關權位、聲望、榮譽及財富。它們是大家關切地注意的目標，是大家關懷備至、魂繫夢縈的事物。」[39]確實，圍繞著科場這一中心，一千多年間不斷上演著一幕幕人間悲喜劇。中舉及第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落第而歸也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記憶。由於科舉與廣大士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一般讀書人都與科舉有一定的關係，從未參加過科舉的只是極少數，多數著名人物都經歷過科舉生涯，因此隋唐以後多數史志、文集、筆記、小說等都曾言及科舉。據有的學者統計，《四庫全書》集部著錄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別集二千五百零四部，其中進士著述一千三百六十七部，占百分之五十四點五九。[40]筆者據朝鮮史籍《增補文獻備考》卷二四七至二五〇「藝文考．文集類」統計，該書所錄韓國（朝鮮）歷史上一千五百部詩文集中，有七百五十五部標明作者為「文科」、「登科」、「司馬」等科第中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之多。即使名落孫山者所寫的著作，也多少找得到關於科舉的趣聞、逸事或民俗等方面的記載。就廣義的科舉文獻而言，中國有關科舉的文獻幾乎可以說是廣闊無邊的，一個人終其一生也難以窮盡所有與科舉相關的資料。[41]因此，為使論題集中，本文著重探討的還是狹義的核心科舉文獻。

關於科舉文獻的種類和數量，須作一定的分類、統計或估算。科舉文獻的種類大體上可分為科舉錄、硃卷、八股文和試卷等幾個類別，其數量則應區別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科舉文獻和現存的科舉文獻的數量。

進士登科錄、進士同年齒錄、進士履歷、進士履歷便覽、進士題名

39 曾德昭一六六七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個部分的中國通史》第8章，61。轉引自Ruth Hayheo and Marianne Bastid ed.,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N. Y.: ME. Sharp, Inc., 1987), 24.

40 吳建華，〈科舉制下進士的社會功能〉，《蘇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蘇州），90~97。

41 劉海峰，〈論「科舉學」的廣博性——以福建科舉為例〉，《東南學術》，2001年第2期，112~116。

碑錄、會試錄、會試題名錄、會試同年齒錄、會試同年履歷便覽、鄉試錄、鄉試題名錄、鄉試同年齒錄、鄉試同年履歷便覽等，可以籠統稱之為「科舉錄」。這是在浩如煙海的與科舉有關的文獻中最為重要的一個類別或一個部分。唐代從中宗神農時（705~707）起開始有私人編纂記載歷科進士的登科記，到穆宗長慶二年（822）已有十多種進士登科記，宣宗大中十年（856）還曾由官府在以往諸家登科記的基礎上編成一部登科記。宋代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宋代每次科舉發榜後出版登科錄或同年錄。據《宋史．選舉志》載，宋太宗朝定「貢院故事」，於每科進士放榜之後，「列敘名氏、鄉貫、三代之類書之，謂之小錄。」到南宋時，發榜後還賜予進士「小錄錢」，並有專門「主管題名小錄」的人員。[42]元代開科十六次，並開始設立鄉試，因此有鄉試錄和鄉試題名記。明清兩代鄉會試登科錄的刊刻更為規範，據《欽定科場條例》卷四七〈闈墨．試錄登科錄〉載有關規定為：

> 進呈試錄。正副主考官，於闈中將中式三場試卷，每題遴選一篇，正考官撰前序，副考官撰後序，出闈後交提調刊刻。順天鄉試由府尹、會試由禮部恭進。各省鄉試，由督撫咨送禮部，彙齊題交內閣收存。各省鄉試錄，陸續咨送，如會試期近，尚未送部者，查取延遲職名，交吏部察議。[43]

可見會試錄和鄉試錄的刊刻相當鄭重和正規。明代開科九十次，清代開科一百一十二次。[44]那麼，明代就有九十科的登科錄、九十科的會試錄，清代的登科錄和會試錄也各有一百一十二種，總計明清兩代全國一級的科舉錄則有四百零四種。而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來，這樣明清兩代就有二百零二次的進士題名碑錄。

據明代張弘道、張凝道《皇明三元考》和張朝瑞《皇明貢舉考》所載，明初洪武三年（1370）、四年各設十二個，洪武五年設十三個鄉試

42 《登科錄．題名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後，7。

43 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29冊，350。

44 實際錄取一百一十四名狀元。原因在於順治九年（1652）和十二年（1655）實行滿漢分榜，一科取滿、漢狀元各一名。

考場，從洪武十七年（1384）開始，明代多數時間鄉試設有十四個貢院，至嘉靖十六年（1537）雲南和貴州分闈，此後到明末各科都有十五個闈場。[45]這樣，明代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一榜鄉試錄。清代鄉試闈場也是從少到多，順治二年（1645）鄉試僅有六個場所，到順治十七年（1660）後設十五個貢院；雍正二年（1724）湖廣分闈，湖南與湖北分設貢院，光緒元年（1875）甘肅從陝西分闈之後，全國共有十七個鄉試闈場。後來因為太平天國和八國聯軍等影響，一些科次有些省分曾暫停鄉試。據法式善《清秘述聞》、王家相等《清秘述聞續》、徐沅等《清秘述聞再續》所錄各科鄉試情況統計，清代各直省共舉行過一千六百九十七次鄉試，則應有一千六百九十七榜鄉試錄。明清兩代合計共有二千九百九十三榜鄉試錄或鄉試題名錄。許多科年還出有同年錄或鄉試齒錄，甚至全國同科舉人合出直省同年錄，如同治年間由李鴻章牽頭，在各省鄉試同年錄的基礎上，出版了《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錄》。若多數鄉試科榜都出同年錄或齒錄的話，鄉試同年錄總在二千種以上。加上登科錄和會試錄，明清兩代共有至少五千四百種科舉錄。另外，還有武舉登科錄和各省武舉鄉試錄，雖不如文舉錄重要，也有數千種之多。而韓國歷史上曾實行科舉制近千年，也留下了許多科舉錄一類的「文科榜目」或「司馬榜目」、「雜科榜目」，《中國所藏高麗古籍綜錄》[46]便錄有二十八種科舉榜目（主要是司馬榜目）；韓國學者李成茂一九九七年於民音社出版的《韓國科舉制度史》一書中「科舉古文書」一節中，列有韓國現存的雜科、譯科等單科榜目三十四種、西元一五一九至一八八二年之間的六十六種文武科榜目，而且這還基本上不包括司馬榜目。越南也有《大越歷朝登科錄》之類的科舉錄。各國科舉錄的總數估計在八千種以上。此外，清代還印有不少翻譯鄉試錄、翻譯會試錄、拔貢鄉試錄、各省選拔貢同年齒錄，以及府州縣試的秀才錄、貢舉錄等，大體上也可歸入科舉錄一類。

現存的科舉錄遠比曾經刊刻的少。唐代各種登科記到元代以後基本

45 據張朝瑞，《皇明貢舉考》（濟南：齊魯書社，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69冊）

46 黃建國、金初昇主編，《中國所藏高麗古籍綜錄》（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8）。

上都已亡佚，清代學者徐松考證整理成一本《登科記考》。[47]宋代除南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因朱熹為該榜進士和《寶祐四年登科錄》因文天祥為該榜狀元而保存下來外，其餘的都已散失。[48]元代則存有《元統元年進士錄》等十八種不很完整的科舉錄。明清兩代科舉錄存留較多。據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二〇〇〇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明清科舉文化史》收集統計，現存一一四八至一九〇四年間文科各類科舉錄有一千零四十二種。[49]儘管艾爾曼對現存科舉錄的收集已經相當豐富，但由於收尋範圍多限於世界著名的大圖書館，基本上未包括中國大陸許多大學圖書館和省市圖書館及民間的收藏，因而實際上還有不少科舉錄未包括在內。例如筆者所見《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科福建鄉試題名錄》、《道光壬辰（1832）科福建鄉試齒錄》、《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科福建鄉試齒錄》、《光緒癸卯（1903）科福建鄉試齒錄》等等，艾爾曼書便未收錄；筆者購得的《光緒五年（1879）己卯科福建鄉試同年全錄》、《光緒五年（1879）己卯科河南鄉試同年全錄》、《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山東鄉試題名錄》等，也在艾爾曼所列各省鄉試錄之外。而且，若算上各地收藏的複本，並加上武舉鄉會試錄一類，現存科舉錄的數量就相當可觀。科舉錄因為記載同榜科名人物資料完整，故為科舉文獻中最有價值的類別之一。

硃卷刊刻始於明代，明代具體曾有多少硃卷現在已很難知道。至清代則刊刻硃卷普遍通行。各省鄉試都有定額，但實際錄取人數往往與計畫定額略有不同。清代舉人的總數目前尚無精確的統計。筆者據《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錄》統計，該年（1844）全國共取舉人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另據清代來華西方人士按當年各省鄉試錄記載，道光二十八年

47 有關《登科記考》的各種補充和訂正文章已有十餘篇，而集大成者為新近出版的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48 另元代劉塤，《隱居通議．前朝科詔》，卷27，保存有〈咸淳七年同年小錄〉，然不全，僅前三名進士的相關紀錄完整。

49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27-640.

（1849）全國共有舉人一千二百三十三名，[50]光緒十四年（1888）全國共有舉人一千五百二十一名。[51]總的說來，清末每科鄉試所取舉人總數比清初增加不少。按平均每科一千三百名大約計算，清代一百一十二科共有舉人十四萬名以上。清代有進士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名，[52]每名進士和舉人一般都有一分硃卷，則曾有硃卷逾十六萬分，加上通常人們都將貢生的貢卷也歸入硃卷一類，從理論上說清代至少有硃卷十八萬分以上。但科舉廢後，此類科舉文獻因時代變革和社會需求消失，好似水流雲散一樣迅速散失。幸好上海圖書館的有識之士長期以來注意搜集硃卷，集腋成裘，終於達到八千餘卷，於一九九二年由臺灣成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大套《清代硃卷集成》，洋洋四百二十冊，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不過，在全國各地，也還散存一些《清代硃卷集成》未收的硃卷，例如筆者得有光緒壬寅（1902）補行庚子辛丑科江西鄉試舉人廖鑒澄、褚式鎏、廖宗道三人的硃卷，就是在《清代硃卷集成》所收硃卷之外。筆者估算，不計許多重複的硃卷，各地現存的硃卷最少在一萬五千種以上。

八股文或時文是科舉文獻中數量最大的一類，明清兩代產生的八股文不可勝數。正如龔自珍所說：「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當選萬輩矣，既窮既極。」[53]除舉子平日所作八股文之外，大量印刷出來的主要有八股之選本與稿本兩類。選本文非一家，志在推行廣遠，類於總集；稿本文僅一人，由於自行編訂，類於別集。後來八股文刻本又分為四種：一曰程墨，為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曰房稿，為十八房進士之作；三曰行卷，為舉人之作；四曰社稿，為諸生會課之作。[54]按日本東洋史學家宮崎市定的統計，《四書》、《五

50 “Journal of Occurrence: Literary and Military Examination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1849, No. 11, 610.

51 E. L. Oxenham, “Ages of Candidates at Chinese Examinations; Tabular Statement”.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XXII, 1888, 286-287.

52 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190。

53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與人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5集，344。

54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十八房》（長沙：嶽麓書社，1994），卷16，584。

經》總共有四十三萬一千兩百八十六字。[55]但畢竟《四書》、《五經》可供出題，尤其是鄉會試大題的內容有限，而依據《四書》、《五經》作出的八股文卻是無限之多。《四書》、《五經》是題量巨大的標準化作文考試題庫。特別是《四書》，隨便從中抽出一句話、一段話、幾段話、整章，甚至半句話、一個詞，都是一個現成的題目，而同一個題目可以作出各種不同的八股文來。因為明清兩代產生的八股文實在太多，到底歷史上曾有多少八股文已無法估量。稍可統計的是其中闈墨或程墨一類，即鄉會試之後官方刻印的代表性範文。闈墨又謂試錄、程文，現存元代程文只有在日本流傳下來的《類編歷舉三場文選》、《皇元大科三場文選》等。[56]明代闈墨刊刻始於洪武二十一年。除清代順治十八年（1661）和康熙五十四年（1715）後的數年間停止刊刻以外，明清絕大多數時間都在鄉會試發榜後刊刻闈墨，並對刊刻闈墨試卷具體作出規定。[57]因此闈墨的種類數量比明清鄉會試的科次略少一些，大概有三千種以上。另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後，科場要考五言八韻律詩，因而後來又產生了大量的試帖詩，也是難以計數。

至於存流下來的八股文和試帖詩的數量，也是非常可觀。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中曾感歎道：「自明至清，汗牛充棟之文，不可以數計。但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講，圖書館不收，停科舉廢八股後，零落散失，覆瓿燒薪，將來欲求如策論詩賦之尚存留於世間，入於學者之口，恐不可得矣。」[58]確實，大部分八股文和試帖詩等經歷一個世紀之後都已灰飛煙滅了，但由於古代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實在太多，因而儘管長期以來人們棄如敝履，今天還是能找到大量的八股文，只是我們很難準確估計其數量，從阮元的《四書文話》到清末的

55 宮崎市定，《科舉——中國の試驗地獄》（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15。

56 參閱陳高華，〈兩種《三場文選》所見元代科舉人物名錄——兼說錢大昕《元進士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2001，北京），342~372；黃仁生，〈元代科舉文獻三種發覆〉，《文獻》2003年第1期，95~105、177。

57 《欽定科場條例．闈墨．刊刻元魁卷》，卷4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829冊，346~348。

58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三聯書店，1958），227~228。

《大題文府》、《小題文府》、《小題正鵠》、《青雲集》等等，大概僅八股文和試帖詩的選本和稿本及傳授備考方法的專書就有近千種。

科舉試卷是科場考試實際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科舉文獻，同時具有科舉文物的性質。科舉試文簡稱「科文」，[59]是指在科場考試中產生的各類文體和文章，它包括科場策、論、律賦、表、判、誥、箴、銘以及試帖詩和八股文等等。唐、五代、宋、元代的科舉試文在各種書籍中還可找到很多，但試卷實物已蕩然無存。明清時期曾經存在過的科舉試卷，明代就有殿試卷二萬四千六百二十四分，清代有殿試卷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分。現在各檔案館和圖書館，以及民間私人手上還存有不少殿試卷，估計還有好幾千件。明清兩代曾經出現過的會試卷和鄉試卷，則比只取中式者的會試錄和鄉試錄要多，因為鄉會試都考三場，且多數時候每場都不只考一種題目，因此鄉會試考卷數量比鄉會試科次多數倍。鄉試或會試試卷實物存留下來的雖只是一小部分，但在一些博物館、圖書館和民間仍有不少收藏。另外，還有一些清代朝考卷、童生試卷等也屬於科舉文獻的科舉試卷類。而金榜、捷報、試題以及單獨存在的各類《科場禮節》、點名規則、貢院座號便覽、試卷浮票等文書也應歸入此類科舉文獻。

此外，還有大量的科舉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近年來陸續整理了不少清代科舉檔案在《歷史檔案》季刊上發表，如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光緒十九年（1893）廣東鄉試史料，便有三十七件諮文約四萬六千字，[60]而這僅僅是該館所藏一個省的一科鄉試諮文檔案。可想而知，清代兩百多年間全國和各省的各種科舉檔案數量之巨。

總之，科舉文獻是中國歷史文獻中的一個大類。由於科舉文獻不僅

59 《元史．選舉志》，卷81載：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下詔恢復科舉，並規定：「鄉試中選者，各給解據、錄連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禮部，腹裏宣慰司及各路關申禮部，拘該監察御史、廉訪司，依上錄連科文申台，轉呈都省，以憑照勘。」2020。韓國歷史上的「科文」與中國類似，包括詩、賦、策、論、表、銘、誥、頌等文體。參見李炳赫，〈韓國科文研究〉，韓國《東洋學》第16輯（1986），1~33。

6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光緒癸巳科廣東鄉試史料〉（上）（下），《歷史檔案》2002年第1期，37~48、第2期，54~72。

獨特而且量大，因此許多古籍書目多將其單獨列為一類，如日本《國會圖書館漢籍目錄》、《東洋文庫所藏漢籍分類目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等都在政書類中列有「科舉學校之屬」，《增補東洋文庫朝鮮本分類目錄》還專門立有「榜目」一類，韓國《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總目錄》史部也有「榜目．科譜」類。美國和臺灣地區一些中國古籍收藏較夥的圖書館的分類也與此類似。當今美國漢學界中科舉研究的代表人物艾爾曼認為，科舉文獻是中國古代文獻中重要的一個獨立類別，其價值還有待人們進一步利用。在他的個人主頁中，提供有《中國史經典文獻目錄》，[61]內中第十三類文獻便是文科舉和武舉文獻目錄，收錄了宋元明清科舉專門文獻目錄。

從元代至清康熙年間的書目中往往將科舉參考用書獨立成類，特別是明代的書目分類中多列有「舉業類」或「制舉類」書目。[62]到了清末，歷代科舉文獻已是疊床架屋。光緒二十九年（1903）編輯的科舉改革後在科場中採用的策問目錄，確認採用三十二個類目，其中科舉與治道、學術、內政、外交、時事、學校、官制以及財政、幣制、防務、農政、工政、輿地、史學等並列。[63]這說明當時科舉已是世間所有事物和學問中一個獨立的大類，因而與之相關的科舉文獻也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和專門性。舉例來說，天一閣豐富藏書中獨具特色且最有價值的部分是明代地方志和科舉錄，這兩類藏書與家譜一起構成天一閣的特色收藏。像鄉試題名錄、會試同年齒錄、進士登科錄等科舉文獻完全是獨立於地方志、家譜族譜等之外的一大文獻類別，而研究方志有「方志學」，研究譜牒有「譜牒學」，研究科舉自然可以形成「科舉學」。因此，數量龐大的專門科舉文獻自成一類便是「科舉學」得以成立的原因之一。

---

61 http://www.sscnet.ucla.edu/history/elman/ClassBib/

62 周彥文，〈論歷代書目中的制舉類書籍〉，《中國書目季刊》31卷1期（臺北），1997年6月，1~13。

63 《中外時務策問類編大成．目錄》（1903），頁1~28。參閱艾爾曼，〈從前現代的格致學到現代的科學〉，《中國學術》第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43。

# 四、科舉文獻與「科舉學」

一門專學必有特定的研究對象或特有的文獻，如甲骨學、敦煌學、方志學、譜牒學等。新資料的發現往往促進新學問的產生。「科舉學」雖然不像甲骨學、敦煌學，沒有以一個出土、重見天日的重大考古發現為契機，而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舊事物或老古董。但由於科舉研究的內涵和價值極為豐厚，人們逐漸發現了科舉研究的意義和科舉文獻的價值，也屬於新發現和大發現，因而也具備了成為專學的條件。我們知道，徽州文書的學術價值高是由於徽州文書具有啟發性、連續性、具體性、真實性和典型性。[64]相對而言，科舉制和科舉文獻的重要性、廣博性、連續性和獨特性要比一般專學的研究對象更為突出。

「科舉學」的性質類似於甲骨學、敦煌學、文選學、紅學等傳統學術領域中的專學，其研究對象十分專門獨特。但由於其研究對象科舉制度存在的時間跨度大、空間範圍廣，因而「科舉學」的研究領域非常廣闊，具有明顯的廣博性。不像其他多數傳統學術領域中的專學通常是關於一時一地或一人一書的學問，「科舉學」是與一千三百年間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書籍和幾乎所有地區有關的一門學問；不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局部，而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整體的一門專學，又是至今還有相當現實意義，並和東亞及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有關的一門專學。「科舉學」的廣博性，充分體現在科第人物不勝枚舉、科舉術語成千上萬、文獻資料浩如煙海、影響地域無遠弗屆等幾個方面。這裏，我們僅從科舉文獻的角度，便可明顯地看出「科舉學」的廣博性。

學術界對科舉文獻的價值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當人們不再以政治左右學術的時候，不再受清末廢科舉時激憤情緒所影響的時候，就會意識到曾經長期深刻影響中國社會歷史各個方面的科舉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進士、舉人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菁英人士，科第人物身處當時主流社會，為維繫傳統文化風教的主要群體，對政治之推移、社會之嬗變、文化之傳承，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科舉作為他們登進仕途的

64 周紹泉，〈徽州文書與徽學〉，《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北京），51~60。

轉捩點，記載他們科舉經歷和家世出身及其它相關資訊的科舉文獻，自然具有珍貴的價值。但科舉文獻作為歷史文獻中的一個大類，以往在中國大陸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很少有像科舉文獻這樣數量眾多、價值甚高卻尚未被充分利用的一類。科舉文獻在研究政治史、教育史、社會史、文學史和區域文化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價值，是尚待開發利用的一座文獻寶庫。科舉文獻的價值大體也可以分成以下三類文獻來分析。

登科錄、進士錄、鄉試錄等「科舉錄」是當時官方編印的載有及第者三代或五代以上祖先的文獻，其史料價值已為史學界尤其是海外史學界所公認。一九四七年，美國漢學家柯睿格根據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同年小錄》統計，在可考家庭背景的二百七十九名進士中，父祖二代中全無做官的有一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六點三；根據寶祐四年（1256）《登科錄》統計，家庭背景可考的五百七十二名進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三百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七點九，因此科舉造成了相當範圍的社會階層流動。[65]一九五五年，張仲禮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紳士》一書，也使用了一些直省同年錄和秀才一級的科舉文獻。[66]難能可貴的是，明清兩代進士一級的科舉錄，各科基本上可以銜接起來，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一九六二年，何炳棣在美國出版的《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一書，根據明清大部分科榜的進士題名錄、會試錄和一些鄉試錄所載數萬名進士、舉人的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對當時中國的社會階層流動率作過詳細的實證研究。作者利用五百多年間如此大量系統的記載三

65 E. A. 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1947). 115-116. 然而，Robert Hymes 和Robert Hartwell認為兼考及第者的婚姻關係或交游關係，多數人的社會背景都不那麼平凡，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並不大。參閱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中譯本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iii~xiii。

66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該書一九九一年以後有了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雖然該書使用的科舉文獻不太多，但也較早注意到科舉文獻的歷史價值並加以利用。

代以上家世出身的文獻，引起歐美歷史學者的驚奇，因為在十九世紀以前任何歐洲社會都沒有類似數量和價值的資料。[67]該書是充分利用科舉文獻的成功範例，只是作者未能使用天一閣所藏大量的明代科舉錄。

對元代進士錄深有研究的臺灣清華大學蕭啟慶教授在一九八三年曾指出：「《進士錄》、《登科錄》一類史料的價值，早已為史學界所公認。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利用這類史料研究明、清兩代的社會及政治制度，已是成績斐然。」[68]他不僅對元代各科進士的有關文獻進行校注輯錄，而且還利用較完整的《元統元年進士錄》研究元代的社會階層流動，認為元代科舉制度雖受不少局限，但仍有助於減少門第、種族、地域的隔閡，以文學經術為評準，為元代統治階層注入一批學養、背景相近似的新菁英。[69]于志嘉利用明代登科錄研究明代軍戶的社會地位問題。[70]日本學者中譱敏對宋代僅存的兩榜進士登科錄的價值作了充分的肯定，[71]大野晃嗣也曾利用明代進士《同年齒錄》的資料來研究明代廷試合格者的初任官問題。[72]對進士登科錄、同年齒錄所載資料，可以從政治學角度研究同榜進士的政治關係，可以從社會學角度研究進士的三代家庭出身背景進而計算社會階層流動率，可以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科名人物的區域分布，可以從人口學角度統計各朝代中試者平均年齡的

67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1962). Foreword, x. 作者自題該書中文名為《明清社會史論》，實際上該書中心內容為明清兩代科舉與社會流動，因此一九八七年韓國學者曹永祿將其譯成韓文以《中國科舉制度——社會史的研究》為書名在東國大學校出版部出版，一九九三年日本學者寺田信隆、千種真一將其譯成日文以《科舉と近世中國社會：立身出世の階梯》為書名在平凡社出版，都凸出了科舉的主題。

68 蕭啟慶，〈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上），《食貨》第13卷第1期（1983，臺北），72~91。

69 蕭啟慶，〈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漢學研究》第5卷第1期（1987，臺北），129~160。

70 于志嘉，〈明代軍户の社會的地位にっぃて——科舉と任官において〉，《東洋學報》71卷3、4號（1990，東京），311~351。

71 中嶋敏，〈宋進士登科題名錄と同年小錄〉，《汲古》第26號（1994，東京）。

72 大野晃嗣，〈明代廷試の合格者と初任官ポスト——《同年齒錄》とその統計的利用〉，《東洋史研究》第58卷第1號（1999，京都）。

變動等等。唐、五代、宋、遼、金、元各朝登科記保存雖少，但登科記總目俱在，許多人名仍可考，至少為研究同年進士的政治關係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就同年進士的關係作政治學研究，目前僅有何冠環於一九九四年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除此以外，對中國歷史上七百二十五次進士科榜多數未曾作過同年關係的研究。[73]至於明清鄉試舉人榜，材料更多，更是無暇顧及。因此，此類科舉文獻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關於硃卷的價值論述較多。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較早認識到硃卷的價值，他在一九三七年寫成，一九四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一書中，除了利用幾種鄉會試同年齒錄以外，還利用了十七分硃卷，他認為硃卷必具履歷，而履歷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個題名，等於一本簡略的家譜。[74]一九四七年，潘光旦、費孝通發表〈科舉與社會流動〉一文，認為硃卷詳盡記載作者的履歷和家世，成為研究社會流動極為合用的材料，並說：

> 履歷部分還要分譜系和師承兩部。譜系包括作者的親屬源流，師承包括作者的學業源流。生物和社會的淵源並重很合於現代遺傳與教育並重的看法。在譜系方面更是分上下兩欄。上欄載正支上行嫡系親屬（包括立嗣關係在內）及其配偶。下欄載旁支上下行同族親屬及其配偶，而且祖輩以下女性親屬（祖姑、姑、姊、妹）及其配偶也載入。在譜法上說，兼及母系（各世代妣氏的父祖曾高亦多列入注中）及姻親是極合理的，而且可以從此項材料追尋各家婚姻結合，推見各家生物性的關聯。在師承方面分受業、問業、受知三種。有些卷子更把師承或教育部分也分上下兩欄，下欄加辟益友一項。

73 如上所述，史學界對紹興十八年（1148）、寶祐四年（1256）和元統元年（1333）「宋元科舉三錄」所記載的同榜進士已有較多的研究。對韓愈與歐陽詹所在的唐德宗貞元八年（792）「龍虎榜」也有專文探討，見John Lee, “The Dragons and Tigers of 792: The Examination in Tang History”. *T’ang Studies*, No. 6,（1987, Madison, Wis.）,25-27。不過這些研究都著重在科舉與社會階層流動而非同年關係。

74 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見《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262。

> 如果我們想研究這些人物的思想、學術、政見的流傳，這項材料也是有用的。[75]

顧廷龍先生也認為硃卷於每人之履歷、直系親屬、近支統系，無不備載。尤可貴者在於師承傳授淵源，為它處所罕詳。自科舉廢後，均罹論斤覆瓿之厄，劫後所存，益覺可貴，並認為硃卷履歷當以家譜縮影視之。[76]他在《清代硃卷集成》序中說：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獻價值，「作為應考者的檔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資料在一定程度是較之家譜更為真實確切。如今人們已經認識到家譜是研究人口學、社會學、民俗學及宗族制度等方面不能或缺的文獻，殊不知硃卷對這些研究具有與家譜同樣不可忽視的作用。」他還認為硃卷的履歷是不可多得的傳記資料，而硃卷的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從試文與考官的評語、薦語及批語中，不僅可以辨別清代取士的評判標準，更能窺見清代教育狀況之一斑。現在已有一些學者對《清代硃卷集成》進行研究，並取得頗有價值的成果，如通過硃卷的準確記載來考證發現一些著名人物懸而未決的籍貫、族屬和生年等問題，研究科舉世家問題，考證蒙古旗人的社會生活問題等，以及研究硃卷本身的應試功能等。[77]有的學者認為，清代硃卷的文獻價值在於，硃卷履歷的內容具有多樣性的特點，所記載的不僅是應試舉子本人的傳記資料，更重要的是其世系史料，成為研究清代家族與科舉制度尤其是著名科舉世家最完整的家族文獻。[78]

人們對八股文的價值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過程。一九〇一年廢八股後，八股文被視為腐朽的醜類被人們迅速唾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八十年代以後，人們逐漸意識到八股文也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清末被深惡痛絕而掃進文字垃圾堆中的八股文，又被重新挖掘出來當作

75 潘光旦、費孝通，〈科舉與社會流動〉，《社會科學》第4卷第1期，1947年10月，1~21。

76 顧廷龍，《天一閣叢談. 序》，見駱兆平，《天一閣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3），1。

77 張傑，〈高鶚會試履歷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滿族研究》，1999年第4期，79~82；張傑，《清代科舉家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何懷宏，〈清代硃卷的應試功能〉，《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秋之卷（香港），141~169。

78 張傑，〈清代硃卷的文獻價值〉，《文獻》2002年第2期，232~241。

「文化寶貝」加以研究。八股文研究已成為二十世紀「科舉學」的五大熱點和公案之一。[79]有的學者認為，從研究時文入手，對觀察中國教育史和社會文化史可以有一些新發現和新認識，「時文的研究是一個新領域。」[80]關於八股文的研究價值，文學界已有不少論述，於此不再展開。

以上所論，只是狹義的科舉文獻，即單獨存在的專門科舉文獻。而「科舉學」的研究對象是科舉本身及直接與科舉相關的問題，如果包括其他與科舉相關的文獻，或收錄於其他各類文獻中的科舉文獻的話，則包括廣義的科舉文獻，其範圍則更是廣闊無邊了。唐宋至明清多數文集中都有關於科舉的記載，幾乎所有地方志都有記載當地科名的內容，很少有什麼類書中會找不到科舉的部分，差不多所有族譜都有記錄家族中應舉入仕者。例如，科名向來是地方志記載的重要內容，如宋代《三山志》在人物類中專收科名，其他各類人物一概不載。《八閩通志》和《閩書》也有很大篇幅用來記載科第人物，《閩書》記載科第人物的《英舊志．縉紳》就高達五十一卷，占全書總數一百五十四卷的三分之一。在宋代專門的科舉文獻流傳甚少的情況下，賈志楊《宋代科舉》一書主要利用地方志的記載，大體上重構了宋代進士的資料及其地理分布。作者對地方志作為宋代進士數資料來源進行估價，認為雖然有其缺陷，但地方志所載宋代科名錄大體上是正確的。[81]通常地方志對本地科名的記載巨細無遺，甚至偏向誇大，但地方志中記載明清時期的科名資料一般比宋元時期準確得多。

科舉文獻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在以往已出版章中如編《清代考試制度資料》、楊家駱主編《中國選舉史料》、楊學為主編《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的情況下，楊學為研究員還再主編一套近一千萬字的《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已於二〇〇三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多數為廣義的科舉文獻，而且這還只是精選出科舉文獻中的一小部分，狹

79 劉海峰，〈「科舉學」的世紀回顧〉，《廈門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15~23。

80 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年9月，49~68。

81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3-210.

義科舉文獻方面只收錄少量的科舉錄等，而不包括硃卷一類的科舉文獻。由於科舉文獻確是古文獻中的一個獨特的大類，現在已有大學（如浙江大學）在「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培養中開設「中國科舉文獻導讀」的專門課程，可見科舉文獻的獨特性和專門性之一斑。

## 五、結語

科舉文獻不僅數量巨大，並且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發掘利用。中國古代社會可供量化研究的內容以人口、田賦等經濟、物質領域居多，而由於科舉文獻的特殊性，使之成為人文教育領域中最有量化條件，進行實證研究方面之一。現有的科舉研究論著不可謂不多，海內外用各種文字出版的科舉研究著作約有二百多部，專文約有四千篇以上，但還是與科舉本身的重要性和資料的廣博性不相稱，還有許多空白領域尚待填補，還有大量的資料從未被利用過。舉例來說，僅從歷史上著名人物的科舉生涯和科舉觀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寫出成千上萬篇論文，而已發表的這種個案研究的論文如〈陳亮與科舉〉、[82]〈蔡元培的科舉生涯〉[83]之類的雖也不少，但只占著名科舉人物總數的很小部分。科舉廢後重印的科舉文獻在《清代硃卷集成》之外雖也有近百種，但最有價值的科舉錄部分，除了著名的《宋元科舉三錄》[84]得到多次重印以外，只有一九六九年學生書局出版的《明代登科錄彙編》六十六種，[85]及一九九八年前後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

82 朱瑞熙，〈陳亮與科舉〉，見趙敏等主編，《陳亮研究論文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108~120。

83 高平叔，〈蔡元培的科舉生涯〉，《歷史教學》1990年第3期，2~5。

84 徐乃昌編，《宋元科舉三錄》（明弘治刊本，1923影印）。

85 《明代登科錄彙編》的出版實為嘉惠學林之舉。除前舉多篇在日本發表的論文外，還有一些利用此資料的專門研究論文，如蔡惠琴，〈明代中晚期（嘉靖—萬曆）士人科舉心態之探討——就《明代登科錄》的吏治觀論之〉，《輔仁歷史學報》第9期（1998，臺北），113~135；陳長文，〈明代科舉取士中的時務策研究——以登科錄為中心〉，

珍本叢刊》等大型叢書中所收的少量科舉錄。因此，很有必要像全面重印地方志那樣，將現存千餘種科舉錄系統重印出來，以利學術研究。兩岸《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86]及其索引[87]的出版，便給學術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另外，韓國、越南的科舉文獻和西方文獻中關於科舉的記載，也是值得認真開採的文獻寶藏。韓國國會圖書館早已在一九七一年重印《國朝榜目》，太學社也多次重印《國朝文科榜目》，這些榜目已成為研究者必備的工具書和參考書。

古代的「科舉之學」隨著科舉制的終結而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卻留下了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的科舉文獻，為現代「科舉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無論科舉制在歷史上的功過得失如何，它總是一種歷史客觀存在，曾長期左右著士人的命運和文風時尚，一千三百年間，傳統中國官僚政治、士紳社會與儒家文化皆以科場為中心得以維繫和共生，科場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動的一個關鍵場域。對這麼一種內容豐富複雜、影響重大深遠的歷史制度的研究，必然會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科舉學」便是在研究對象重要、研究歷史悠久、研究人員眾多、研究成果豐碩的情況下蔚然成學的，它可以成為考察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獨特視角，而自成體系、豐富繁多的科舉文獻，從一個方面有力地支撐著「科舉學」的學科構架，使「科舉學」這一具有遠大發展前景的專學，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

---

（開封：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1~68。

86 清．李周望輯，清．蔣元益、王際華等續輯，《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87 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Litera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Liu, Hai-feng*

## Abstract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Ke-Ju-Xue* 科舉學）was an expression used in China Imperial Examination times.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ancient times meant "a branch of knowledge about Imperial Examinations ", which generally referred to the knowledge prepared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once including such specialized studies as Study of Selected Works (*Wen-Xuan-Xue* 文選學) and Study of Policy (*Ce-Xue* 策學).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odern times has become a specialized study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ch research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history of its operation exist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international systematic learning.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not a branch of knowledge about one time, one place or one work and one person but a branch of knowledge relevant to well-known figures, most works and almost all Chinese and Korean and Vietnaese districts for 1300 years. It is not a specialized study about some sections but the who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 specialized study with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 the extension of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observed.

Document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a narrow sense mainly include Records of Palace Examination (登科錄), Records of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會試錄), Records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鄉試錄), red copy of examination paper (硃卷), and eight-part essay, selections of Examination Verse (試帖詩), a variety of examination papers in stock and specialized books for preparing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which the number is very large. It is a specialized and independent category among the historic documents of China with high research value for history, pedagogy, polit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humanities and geography. Among examples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 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 Research in Xiamen University.

there is seldom such kinds of literature as document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with in such large number and with such high value, but which are not fully utilized. Documents abou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ith its own system and rich content reflect the extension of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trongly support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one respect. And, they lead to the gradual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is prospective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words:**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科舉學), litera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examination, red copy of examination paper (硃卷), eight-part essays.

（責任編輯：古怡青　校對：鄒金芳　林欣儀）